

# 永乐十一年，曹县“活捉大熊猫”？

## ——探析一场“仁兽献瑞”背后的历史疑云

您敢信吗？六百多年前的山东曹县，竟然上演过一出“活捉国宝”的大戏！这可不是什么野史传说——光绪年版的《曹县志》里写得明明白白：“成祖永乐十一年癸巳夏五月十四日，骑虞见安陵境，主簿应汝济获，以献。祭酒胡俨有诗。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：1413年6月1日，曹县安陵地界（今牡丹区大黄集镇安陵集村，明清时期属曹县）突然冒出只“骑虞”，被一位叫应汝济的主簿逮个正着，当即作为顶级“祥瑞”火速押运进京。连当时的文坛大佬、国子监祭酒胡俨都专门赋诗纪念这桩奇事。

那么，这“骑虞”究竟是何方神圣？古书上说它“虎躯狮首，体魄伟岸”，偏偏又“白毛黑纹，性格温顺”——这描述，活脱脱就是咱们今天的国宝大熊猫嘛！雪白毛皮上泼洒着墨色斑纹，既像猛虎般身姿矫健，又带着雄狮的威严，却偏偏生就一副温顺如羔羊的性子，难怪古人会把它当作祥瑞的化身。

为这只“曹县大熊猫”写诗的胡俨可不是一般人。这位永乐朝国子监祭酒兼翰林院掌书，是朝廷倚重的“大手笔”。他写的《骑虞颂》不仅收录在《曹县志》里，还特意加了段序文，把当时的情景描绘得活灵活现，翻译过来大意是：永乐十一年夏五月，骑虞出现在山东曹县。六月初一，大臣们将它进献给朝廷。这只骑虞长着狮头虎身，带有黑色斑纹，性情仁慈而温顺。

您瞧瞧，雪白的皮毛，黑色的条纹，摸上去估计跟绸缎一样光滑。最绝的是它那性格，任人抚摸都不恼，简直是行走的“和平使者”。

胡俨在序文里还一本正经地考证：“征之载籍，实为神兽。是由皇上盛德之所致，乃太平之嘉应也……”——说白了，就是查证典籍，认定这确实是祥瑞神兽，是皇上高尚品德感召而来的太平盛世之兆。

这位胡俨大人，举人出身，曾任知县，经大才子解缙推荐入职翰林院，想必才学不凡。他写的《骑虞颂》也确实文采斐然，咱们不妨来品品其中几句：“雪花英英莹毛质，玄云冉冉凝天章”——把熊猫的白毛比作雪花，黑纹比作天上的云彩，够形象！“不履生虫性仁厚，虎豹遁迹蛟龙藏”——说它连青草都舍不得踩，性情仁厚，猛兽见了都得绕道走。“窥首班班献金阙，雕花宝扇森开张”——想象一下那场景：雕花木笼里的“神兽”探着脑袋，周围旌旗招展，百官跪地山呼万岁，活脱脱一部明朝版《动物世界》。

最有意思的是诗里还写到“昔者钧州已来贡，重见实由圣德昌”——原来这不是第一次进献“熊猫”！据史料记载，永乐、宣德年间，明朝曾三次接到祥瑞之兽“骑虞”出现的报告，曹县只是其中一次。

这位大儒大概怎么也想不到，六百年后，他笔下的“祥瑞神兽”竟被不少人误认为是今天靠卖萌为生的国宝大熊猫。

自汉代董仲舒提出“天人感应”学说，历代帝王皆以祥瑞为“德政”的注解。永乐年

间的明朝官场，更像是“祥瑞收集大赛”现场。朱棣刚登基那会儿，浙江上报“嘉禾九穗”，福建献“白鹇”，云南贡“麒麟”（实为长颈鹿），百官动辄以“祥瑞叠现”称颂圣德。在这种政治氛围下，地方官要是发现祥瑞，都不好意思跟上司打招呼。

那朱棣时期为何如此痴迷祥瑞？说到底，还是“心虚”闹的。这位靠“靖难之役”从侄子手中夺得皇位的皇帝，总担心别人说他“得位不正”。频频出现的各类祥瑞，恰如瞌睡时递来的枕头，完美迎合了朝廷对“圣德感召”的迫切需求。

历史学家孟森在《明史讲义》中直言：“永乐间祥瑞之盛，多由地方揣摩上意。曹县骑虞，尤见封建专制官场的虚伪。”朱棣借祥瑞巩固皇权的需求，地方官借祥瑞邀功的动机，文人借祥瑞献媚的笔墨，共同编织了这场闹剧。

当然，历代从不缺少清醒者。清代学者赵翼就曾犀利指出：“三代以下，祥瑞之多，无过明代。然以理推之，皆不足信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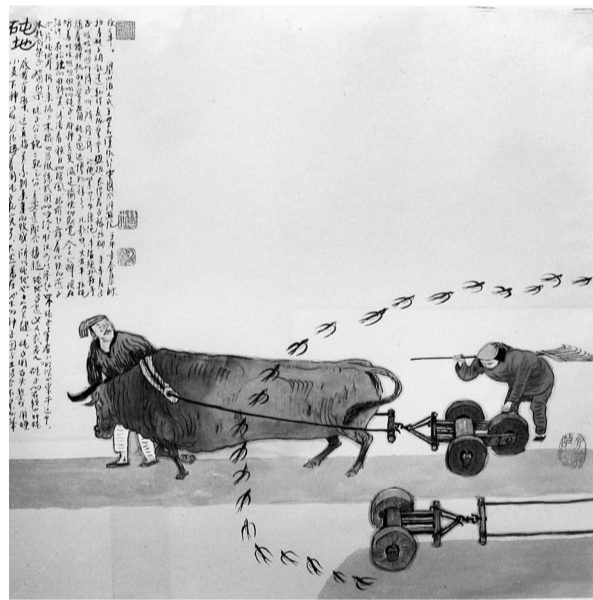
从地理常识看，曹县地处温带，根本不适合大熊猫生存。因此，所谓永乐年间曹县出现“大熊猫”一事，确实十分可疑。这场六百年前的“祥瑞”闹剧，最终化作了一面历史的镜子：它照见过往的愚昧与投机，也映照出今天的清醒与理性，更反映出大众认知的进步——我们终于明白，真正的“祥瑞”从不是虚构的神兽，而是对自然的敬畏、对科学的尊重，以及对“实事求是”四字箴言的坚守。

张荣昌

## 回到历史深处



## 鲁西南风情



图/王世会

## 耧地

歌谣曰：大黄牛，拉耧子，吱吱扭扭叫阵子；叫一阵，停一停，让俺紧紧牛绳；牛绳紧，抓在手，拉着耧子胡乱走；轧得麦垅弯弯扭，长得麦子稀拉柳，来年麦子收半斗。

以前，在广袤的华北平原，当秋日的最后一丝余温还在大地上徘徊时，一场关乎来年丰收的农事便悄然拉开帷幕。秋种小麦之后，耧地便陆续展开。播种后的土壤较为疏松，种子与土壤接触不密实，农民称之为“喝风”，既影响种子吸水发芽，也不利于冬季保温，直接关系到收成。为此，先民发明了耧地之法。

耧地的核心工具是耧子，通常由两至三个石制圆轮组成。石轮直径约三四十厘米，厚十几厘米，中心穿孔，穿木为轴，外加硬木框架固定。为匹配播种的耧腿数量，耧子分为两轮或三轮，轮距与垄宽一致。整个耧

子重达百余斤，靠石轮滚动压实土壤，既能保墒防旱，又能为麦种保暖，显著提高出苗率和成活率。

使用耧子时，可由一两人在前牵引，或套牲口拉动。操作者须准确把握方向，使石轮精准压过垄沟。耧子行进间发出“咕噜咕噜”的声响，如同农田里的节奏乐章。妇女和孩子常跟在后面查漏补缺，用脚踩实未压到位之处。

耧地也是乡邻互助的体现。谁家人手不足，旁人便主动相助，田间洋溢着互助与温情。

耧地，是秋天里一场充满希望的农事。伴着未雨前的燕鸣与耧子的吱呀声，构成一幅有声有色的农耕图景。它不仅凝聚着农民对土地的深情与期盼，也承载着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记忆。

文/孔伟建 图/王世会

## 菏泽地名前世今生

### 莲

莲王村是郓城县南赵楼镇的一个行政村，由前王庄、西王庄和东王庄三个自然村组成。该村位于郓城县南部，距郓城县城约26公里，距巨野县城约16公里，距镇政府驻地约3公里，交通便利。

据记载，明朝洪武元年（1368年），王氏先祖自山西洪洞县迁至济宁曲阜，清初又迁至赵楼镇官屯，后定居于此。因村东南有一片洼地常年积水，水中生有莲花，故被称为“莲花池王庄”或“莲花王庄”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村更名为“莲王”。清同治年间（1862年—1875年），王氏族人又分别向南、西两个方向建村，按方位取名前王庄与西王庄。明初，另有王氏一支从曲阜迁至本镇官屯，后迁至莲花池王庄东侧建村，取名东王庄。至此，前、西、东王庄共同构成莲王片区。

清康熙四十七年（1708年），唐氏十三世祖从本县陈里迁入莲王，至十五世祖与王氏联姻，两姓世代和睦，素有“唐王不分”之说。

莲王在清末属郓城县玉东里，1928年划归四区礼厚乡。1940年至1942年属郓南县五区，1944年改属郓县四区，1952年划入郓城县七区。1958年初属王老虎乡，同年秋成立莲王大队，归属赵楼公社。1963年改属陈里公社，1972年设立莲王村民委员会，属南赵楼乡，2016年随南赵楼乡改镇而属之。

历史上，莲王一带长期属兖州府管辖。相传此地曾为曲阜孔府祭田，孔家佃户在此挖池种藕，所产莲藕直供孔府。

莲王村流传着一则神话：因地处低洼，黄河屡次决口致灾，洪水过后常伴瘟疫。某日晴空万里，忽见白衣观音脚踏莲花，手持宝瓶自天而降，以柳枝洒甘露驱除疫病。其脚下莲花落于村东南洼地，形成池塘。每年夏秋，池中莲花亭亭玉立，摇曳生姿，引人遐思。

明末，山东爆发徐鸿儒领导的白莲教起义，莲王村曾为义军据点之一。徐鸿儒原名徐诵，原籍巨野，后迁居郓城，早年加入白莲教。万历年间，因土地兼并加剧，赋役沉重，社会矛盾激化，他借白莲教组织群众，以手持莲花为联络暗号，莲王村成为其传教据点的重要基地。

1622年农历五月十一日，徐鸿儒在郓城县梁家楼（今武安镇吕庄）发动起义，部众达数万人，被推为“中兴福烈帝”，建元“大乘兴国”，设立官职，建立政权。起义军头缠红巾，奉莲花为圣物，连克郓城、巨野、滕县、邹县等地，控制山东运河两岸，截断漕运，屡败官军。明廷震怒，调集重兵围剿。同年九月，徐鸿儒在滕县弹尽粮绝被俘，于北京就义。余部退至郓城，在莲王村与官军展开激战，双方死伤惨重，鲜血染红莲花池。相传，此后池中荷花皆为血红。

目前，莲王村共351户，1065人，耕地1960亩。村南1公里处为郓巨公路，与周边村庄均由水泥路连接，交通便捷。全村地势平坦，村东有南北大河，南通赵楼新河，北接赵王河，王垓河绕村而过，辅以人工开挖河道，水利条件优越。

今日的莲王村村民已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，而有关莲花池的传说仍在世代流传，成为村庄不可磨灭的文化记忆。魏建国

# 故丘历千霜 凭栏话沧桑

## ——单县老山堤顶的人文记忆

在单县悠久的历史进程中，老山堤顶作为一处重要的地理标识，是不可或缺的文化遗产。

老山（堤）顶遗址现隶属于南城街道。尽管行政区划与机构几经变迁，它始终延续至今，成为单县百姓共同的集体记忆。

据《单县志》记载，远古时期，单县故城西南部形成一座大土丘，后有民居聚集，渐成部落，遂以“老山堤顶”为名。

相传，老山堤顶上曾筑有一座土台，古槐环抱，枝繁叶茂，遮天蔽日。每至黄昏，夕阳余晖映照，云霞绚烂如锦，蔚为壮观。

明代夏维藩有诗云：有山不数仞，乃近城南堤。秋崖生紫翠，林樾荡烟霏。夕阳透锦楼，掩映相低迷。迥无尘埃扰，而有幽人栖。我来聊乘暇，披云一攀跻。安得谢轮鞅，鹿车同招携。

因此诗，老山堤顶得名“栖霞山”，“栖霞晚照”亦成为单县古八景之一。

后来，土丘上筑台以纪念西汉梁王刘武。据载，公元前168年，汉文帝刘恒封其子刘武为梁王，建都睢阳（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）。刘武去世后谥号为“孝王”，民间多称“梁孝王”。

《单县志》记载：“梁王好营宫室，建东苑延亘三百余里，单父于其中。”“单父”为单县古称。刘武以睢阳为中心，修建规模宏大、富丽堂皇的梁园，用于游猎休闲，单父的栖霞山正是其中一部分。

唐代诗人李白曾多次游历单父，留下诸多诗篇。天宝三年（744年），李白被唐玄宗“赐金放还”，辗转至单父，与杜甫、高适、陶沔相会，把酒抒怀。李白有感而发：“吾家

青萍剑，操割有余闲。往来荆二邑，此去何时还。鞍马月桥南，光辉歧路间。贤豪相追惜，却到栖霞山。群花散芳园，斗酒开离颜。乐酣相顾起，征马无由攀。”诗中记述了李白在栖霞山为族弟李凝钱行的场景，情真意切。

追随李白的足迹，唐代广陵诗僧一也曾游历单父，作《栖霞山夜坐》：“山头戒坛路，幽映雪岩侧。四面青石床，一峰苍翠色。松风静复起，月影开还黑。何独乘夜来，殊非昼所得。”诗中描绘了栖霞山夜色静谧、意境幽远的景致。

至清末，栖霞山逐渐荒废，仅存梁王台遗址。清代单县诗人王润在《梁苑怀古》中感叹：“旧游何处问梁王，单父城边野草荒。闻道离宫连汉苑，久无嘉客似邹阳。南来河水殊今昔，夕照霞山复渺茫。陵谷千年经几变，登临指点说沧桑。”

清代兵部尚书刘峨晚年归乡，亦作《栖霞山》一诗：“梁王游观定何处，李白酣乐亦长语。两家遗迹同扫除，来者脉脉去者踞。有客立马临斜阳，就中颇爱青莲狂。青萍宰割不得意，鞍马歧路成沧桑。”

从西汉梁园的皇家气象，到唐代诗人笔下的“栖霞晚照”，再到明清文人的追忆与感怀，老山堤顶串联起单县的历史文脉，折射出不同时代的人文气象与情感世界，这也是其作为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所在。

文图 通讯员 刘波



图/刘波



门坊上的牌坊



堤顶上的栏杆



梁王台

## 趣谈鲁西南方言土语——「二虎」

“二虎”一词，在鲁西南一带并非人名，而是一个带有贬义的方言词汇，常用来形容人莽撞、粗野、冲动甚至“缺心眼”。即便孩子长得虎头虎脑，也极少有家长会用“二虎”取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“二虎”中的“二”字在当地方言中的发音特殊，需舌抵上齿才能准确发出，难以用汉语拼音直接标注。

关于这个词的意涵，成武县白浮图镇流传的“马二虎”故事，可作生动诠释。清末毓贤任曹州知府时，当地连年灾荒，盗贼四起。毓贤治盗手段严酷，动辄杀戮或用站笼处死，虽一时震慑，却非治本之策。成武县白浮图镇的马某，青年从军，效力于毓贤麾下。他身高近两米，臂力惊人，二三百斤重物在他手中如玩物。遇有匪情，将匪窝包围完毕后，马某总是打头阵：他摸进院里，一脚就将住户大门踹开，随后“嗖”的一声跳进房内，没等里面的人反应过来，已抓住对方腰带，扼着脖子把人一个个甩出窗外；外面的兵士早已备好绳索，甩出来一个捆一个，根本不费力气。

一次，毓贤在曹州西关黄巢点将台校场举行射击比赛，悬重赏激励士卒。有人枪法精准，弹无虚发；有人击落飞鸟，技惊四座。马某为拔头筹，竟高声提议：“谁敢比赛头顶打鸡蛋！”此言一出，满场皆静。鸡蛋好打，关键是准敢顶蛋为靶。此举既考验枪法，更考验胆魄，稍有不慎便人命关天。正当众人犹豫之际，同乡魏某挺身而出，顶立于百步之外。马某举枪便射，蛋碎人安，全场喝彩如雷。毓贤目睹这惊险一幕，脱口而出：“恁二虎！”毓贤这样说，并不是夸赞二人，而是对他们莽撞行为的担忧与责备。但艺高人胆大，反而成就了他们。于是，“马二虎”的外号就流传开来了，马某也因此被擢升为毓贤的亲兵营哨官，“马二虎”之名遂不胫而走。

那么，“二虎”一词从何而来？其渊源或与山东好汉武松有关。《宋史·侯蒙传》载：“……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、魏，官军数万无敢抗者……”北宋末年，宋江带领三十六人起义，其中就有“行者武松”。武松在民间传说中曾于景阳冈打虎，却非主动为之，而是不得已而为之。《水浒传》对这段情节有详细描写：武松在景阳冈酒家饮酒后欲过冈，店主劝他留宿，待次日上午与人结伴而行。武松却酒意上头，误以为店主谋财害命，执意夜间过冈。行至冈上，见树皮上的警示标语，仍固执己见：“这是酒家讹诈，惊吓那等客人，便去那厮家里宿歇。我却怕什么鸟！”直至走到山神庙，看到盖有官府大印的告示，才知真有老虎。他想返回，又寻思：“我回去时，须吃他耻笑，不是好汉，难以转去。”实则武松内心惧怕，却怕人笑话，遂抱侥幸心理走上冈子。打虎之后，猎户问其姓名，他答：“……姓武，排行第二……”自此，武二不逊劝阻、上冈打虎的故事广为流传。

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。民间有人认为，武松本就是不听劝、行事莽撞之人——若冈上有第二只老虎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武松自身恐怕也这般认为。因此，“武二哥打虎”又多了一层含义：办事缺根筋、不考虑后果，莽撞冲动、我行我素。许多人没有武松的本事，却学武松的脾气，这便是鲁西南民间所说的“黑二虎”，最终往往酿成不良后果。水泊梁山地处鲁西南，武松作为梁山好汉，其故事在本地流传尤其广泛；加之《水浒传》的影响，更是深入人心。“武二哥打虎”在山东千年的民间话语传承中，渐渐浓缩为“二虎”。后来，山东人“闯关东”将这方言带至东北，使之成为北方多地通用的词汇。

随着语言演变，“二虎”又简化为“二”，如说某人“大二”，即指其行为不合常理、不够精明。一词之变，亦折射出语言与社会互动的发展轨迹。张长国 张鲁学